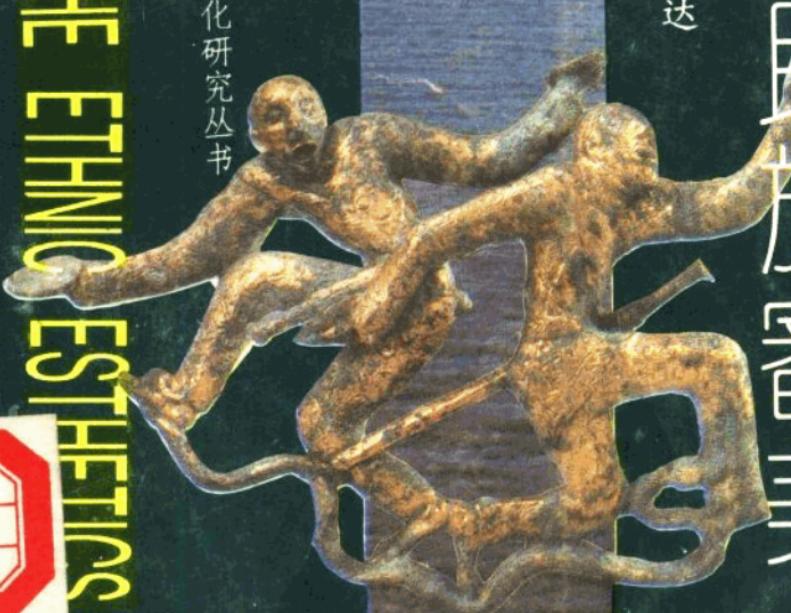


滇文化與民族審美

主编 张文勋 副主编 施惟达

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

DIAN CULTURE AND THE ETHNIC AESTHETICS



张文勋

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 文化研究丛书》弁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想，民族经济文化的建设，也绝非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我国西南边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采而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现在，我们的祖国正掀起“四化”建设的高潮，开发大西南是举世瞩目的宏图壮举；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云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并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的高等学府。自一九二二年建校以来，国内许多知名学者曾在此执教。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

张文勋

学技术人才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开发西南边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方面，也卓有建树，成绩斐然。以社会科学领域而论，早在三、四十年代，我校就有一批著名学者，开始注意对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他们在财力物力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经过他们的辛勤耕耘，出版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其中有不少著作，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西南边疆学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提高云南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突飞猛进的时代，云南大学也在不断发展中。我们所担负的时代使命更重了，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学校也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学术水平，有效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开发大西南服务。

云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大学，她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完全有条件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应用性学科的研究。尤应注意结合地方特点，发挥优势，对某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争取在国内外取得领先地位。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以民族众多而著称；加之与贵州、四川、西藏、广西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毗邻，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开发研究。因此，学校决定成立“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并以此作为云南大学文科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这既适应我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可以发挥我校文科的综合学术优势。为了激励大家的研究热情，争

取使研究成果得以出版问世，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这将是一套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学科学术性丛书，其内容包括与西南边疆民族有关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历史、民俗、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专著。这些专著，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研究成果。入选的原则，决不因人列书，也不存门户之见，举凡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论联系实际，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俱在入选之列。在学术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讨论。

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做好选稿、审稿和出版工作，我们组成编辑委员会。凡是列入丛书的项目，都需经同行专家评审推荐，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对促进我校文科学术研究的开展，促进文科的学科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云 南 大 学

《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张文勋

副主编 李子贤 杨寿川

编 委 林超民 秦家华 徐光远

施惟达 刘小兵

目 录

绪论	1
· 上 篇 ·	
第一章 悠远长存的神话世界	15
云南：丰饶的神话高原 (16)	
神话中的滇文化心理 (29)	
神话哺育的审美 (46)	
第二章 铜鼓文化中的美学之光	61
从饮爨到节歌 (62)	
形制：时空中的变化 (70)	
具象与抽象：丰厚的文化内涵 (83)	
神圣热烈的铜鼓乐舞 (95)	
第三章 爨文化浇灌的艺术奇葩	106
碰撞中的崛起 (107)	
“梁堆”墓葬的艺术珍品 (118)	
大小爨碑：历史的骄傲 (126)	

第四章 南诏大理国的审美演进

139

- 土巫佛道汇融的文化特质 (140)
 - 多元复合的审美文化特征 (154)
 - 跃进中的悲剧精神 (159)
 - 回归与升华 (168)
-

· 中 篇 ·

第五章 “贝叶文化”哺育的傣族文学

175

- 混融一体的原始文学 (178)
 - 佛教的传入及文化重组 (184)
 - 贝叶经与文学的发展 (193)
 - 雅俗文学的分与合 (202)
-

第六章 东巴文化的艺术个性

214

- 蔚为奇观的东巴文化 (215)
 - 独具特色的宗教艺术 (221)
 - 审美的主题 (234)
-

第七章 毕摩文化的审美精神

255

- 多样中的统一 (256)
 - 古拙的旋律 (261)
 - 生活的美意识 (277)
-

第八章 茶马古道上富有审美情趣的茶文化

291

红土高原飘起的彩带 (292)

滇茶的魅力 (296)

色彩斑斓的文化与艺术 (303)

·下 篇·

第九章 节日文化与审美走向

317

古老文化的形象演示 (318)

情感的纽带 (338)

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347)

第十章 服饰文化的审美形式与意蕴

357

自然与历史的交结 (358)

美感永驻的奥秘 (369)

斑斓的体饰奇观 (376)

琳琅满目的装饰物 (383)

第十一章 滇文化景观中的建筑艺术

391

融在自然山水间的民居 (392)

通往彼岸世界的驿站 (407)

桥梁建筑中的文化冲突与聚合 (419)

第十二章 汉文化浸润的滇云文学理论	425
汉文化的传入与滇文人创作 (426)	
蕴玉含珠的滇云文论 (432)	
以儒学为宗的《酌雅诗话》 (437)	
出入儒学的《诗法萃编》 (444)	
旨宏论精的《筱园诗话》 (452)	
余论：云南审美文化的今天和明天	460
多维的现状描述：传统与变异 (462)	
形式和意味的演变动力 (470)	
滇文化的发展与悖谬 (476)	
阐释未来 (489)	
后记	499

绪 论

当我们拟出“滇文化与民族审美”这一课题时，我们好象面临着一个不甚确定的研究对象。文化，不管是强调其精神方面、还是器物方面，不管是侧重其作为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还是作为“生活”和“存在”的特有方式，抑或视其为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综合体”，它总是具体的，有自己的特质和界限。如果不是在哲学层面上，说人类有一种共同文化，以此区别于动物就不会有更多的意义。于是自然就有东西文化之别；在东方文化中，又有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日本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的差异；在中华文化中，有中原远古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后来的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等…以至现在的东部沿海文化、中部内陆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名目繁多，形态各异。毫无疑问，要确立一种文化形态，必然要列出其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质，它可以是社会的结构组织样式、生产方式、制作技术、行为习俗，或思维模式、观念心态等各个层面上的。而且，一种文化形态也必然有其空间和时间的界限，空间标示它的区域性，时间标示它的历史性。显而易见，不存在一种超时空的文化形态。

滇文化，它的时空界限在何处？它的特质又是什么？

现今位于祖国西南边陲，面积 38.3 万平方公里，地图上的形状颇象一只啼晓金鸡的云南省，虽简称为滇，却与楚庄王滇时的古滇国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不等于东汉设立的“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永昌郡，或唐宋两代的南诏及大理国。就是和元代始建的云南行省，也不完全一样。从时间说，上述各区划都自有期限，我们今天所称的云南省，其历史是很短的。这样，我们的所谓“滇文化”，就处于确指的狭隘性和泛指的模糊性的两难困境中。但是，在困境中，似乎又有生机。纵观历史，虽然沧海桑田，但云南高原总体的自然地理环境没有改变，众多民族（部族）在这块古老大地上迁徙繁衍，创造生息的活动没有中断过。还有，云南一直是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或许，正是可以在这样一些基点上来界定滇文化的时空外延。

迄今为止的考古材料证明，云南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从腊玛古猿、元谋猿人，到西畴人、丽江人，隐约构成了一条人类的进化链条。有学者认为，元谋猿人是亚洲人类共祖，“甘、青古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元谋猿人的子孙散布于全亚洲乃至从中国东北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大陆，为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至于迁往甘、青为远古羌戎，则继续往西北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往东迁达山东半岛而为远古炎帝神农氏和周代所封齐姜（即羌）。”¹这历史是否确如所言，作为一家之言暂且搁置不论。可以证实的是，云南分布甚广的新石器文化，与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有肩石斧，双

¹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总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孔（或多孔）的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尤其是洱海地区马龙峰下遗址中还发现鼎的残足，这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器物，在世界其它地区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云南新石器文化确乎又不等同于古中原和南方其它地区的文化，而具有自己的地域特征。当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搜寻比石器更丰富、更先进的文化创造时，这种地域特征就会更加突出。例如，铜器，尤其是铜鼓，就是起源于云南的典型器物。这说明，云南高原不仅是远古人类的起源、活动地带，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区域文化的创造。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那些仍然存活于市井民间、乡村民俗中的文化事象，其“一方风物一方人”的特点还是很鲜明的。如此，我们可以把滇文化宽泛地理解为，在略等于今天云南省这块版图的红土高原上所创造、溶合的文化。

之所以说略等于，是云南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其境内居住着许多跨境（跨省境、跨国境）民族，这样就形成同一民族文化，不仅云南有，而且周边的省、相邻的国家中也有。要把这些文化说成绝对的云南或滇文化是很难的，唯一的办法是把滇文化的地域边界划得模糊一点。但真正的困难还在于，在这块古老大地上所创造、溶合的文化是如此的繁富纷纭，其中究竟有没有足以构成我们称之为滇文化的共同的特质？

纵观云南文化，我们似乎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即云南文化的多元性。这体现在从宏观到微观的三个层次上。从总体看，滇文化本身是一个多元的构成，它曾有过古滇文化的更替，爨文化的兴衰，南诏大理文化的显赫，明清以后汉文化的复盖，其中虽有一定的承续性，但异质性似乎更多一些。这与中原地区自先秦时期就逐渐形成一个较为明确和清晰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另外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除了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绪 论

外，在不同的地区还并存着诸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例如，傣文化就从来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百濮系的文化也自成一家。云南往往被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视为“化外”之地，殊不知“化外”还有“化外”，真如南诏王异牟寻所叹的“地卑夷杂，杜绝声教”。杂者，类多之谓也。这也正是我们说的“滇文化”的特征。

在不同类型文化的层面上，它也是多元的。文化类型的划分是一件复杂的事，很难有一个笼统的标准。各取其中一点为楷式，都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侧重经济类型，就有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农业文化、畜牧文化，甚或游耕文化、采集文化等；侧重器物——工具类型，就有石器文化、陶器文化、青铜文化、铁器文化等；侧重食物类型，就有粟类文化、稻作文化、杂粮文化、肉食文化等；侧重精神意识，就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巫文化等。总之，斑驳陆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侧重从族源出发，那么滇文化大致可分为属于藏缅语族的氐羌文化、属于壮侗语族的百越文化、属于孟高棉语族的百濮文化等几种主要类型。氐羌文化追溯到甘青高原上的古氐羌族群，其中一部分沿着横断山脉及其水系——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而南下，足迹几乎遍布云南。从地理——经济上看，这是一种高原游牧——游耕文化，“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火葬也为氐羌文化的标志。百越文化源于我国南方沿海的百越族群，其基本特质为稻作、干栏式建筑、纹身等。百濮则被视为云南最早的土著居民，百濮文化或许可称作狩猎文化，“以采猎为务”，“剽牛、猎头，喜山居，

¹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永昌府。

以木棉为纺织原料等。显而易见，这种划分是极其粗略的。实际上，这些都并非纯粹的文化类型，而是交杂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因子于其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现象比比皆是。

如果具体到某种文化的微观层面上，则由于云南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格局，以及外来文化的不断渗入、交流，很容易形成了文化构成的多元态势。在思想意识及信仰方面，大多受到了儒、道、佛教的不同程度的陶染，往往从偶像到观念都兼收并蓄地纳入自己的文化中。在生产——技术方面，铁器的输入、农耕的传播等，都给不同的文化注进了新的因子。哈尼族在山区借鉴了坝区的稻作技术，形成独特的梯田文化。佤族也在自己狩猎文化的基础上，引进了农耕生产，创造了自己的狩猎——农耕文化。在生活——习俗方面，不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德昂族过泼水节，大约是来自傣族的影响，彝、白、傈僳等族少女都喜欢的鸡冠帽，就颇难考证其谁先谁后了。嚼槟榔的习俗，也存在于多个不同文化的民族中。

滇文化的另一特征是边缘性。从文化圈的理论看，滇文化处于汉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交汇的边缘；从政治格局看，云南两千多年来都位居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随着中原历代王朝势力的盛衰及政策的变化，云南的地方政权有着若断若续、或大或小的独立性。这种边缘态势既造成了滇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又造成了中原文化传播及渗透力的衰减，因而滇文化在大量吸取了各种文化因子后，仍然保留着某种封闭性，未能彻底地溶合进汉文化中去。楚庄王入滇后，只能“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即是一个早期的典型例子。或许是面对一个强大文化力量所产生的心理压力，或许是云南山险水急，大小坝子相互隔绝，往来交通困难的现实条件，使滇文化

绪 论

的创造者们充满了局守一隅的自我认同感。我们称之为边缘文化的边缘心态或边缘意识。它是自卑与自傲的矛盾统一体。如果说，中原汉文化传统中有一种老大自居、独传正统的优越独尊意识，那么滇文化中却有一种自认边鄙之民的心态。前述南诏王的慨叹，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心态。在各民族族源神话及文化解释神话中，也可窥见一斑。另一方面，滇文化意识中崇尚传统，民族认同的色彩也是很浓的，从而整体上各自保持着文化的传承性。有趣的是，不仅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如此，就是进入到云南的汉文化，历代迁入云南的汉族甚至就是派往云南的王朝官员，都往往沾染上这种边缘意识。对中原王朝说，云南是最边远的流放充军之地。被贬谪至此的人，一方面感慨云南的落后少文（缺乏文教礼仪），一方面却为其自然风物所倾倒。大半生在云南渡过的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把安宁温泉命为“海内第一汤”，其《安宁温泉诗序》说：“余尝憾此地限阂中原，使此泉湮没，不得遇风流之宋玉，神俊之太白，瑰玮之长吉，博综之东坡。穿天心，出月胁之奇语，以洗骊山之污，而跻三危、八功之上，四公不可以作矣。”温泉地处绝域，确没有宋玉一干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为其扬名，然而与之相比，骊山华清池显得污浊，仙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也有逊色。这样的比拟，不就颇有些自傲的边缘意识么？

由于这种边缘文化心态和氛围，当然也还有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滇文化的风格往往不以壮大雄奇见长，不以华丽繁缛为尚，而倾向于纤小，倾向于简朴古拙。仔细品味云南的青铜器，云南的建筑，云南的石雕石刻，云南的服饰，似乎大致可以这么说。

滇文化的再一特点是“土”。“土”是云南人对自己及其文化

的一个极简炼的概括。人之“土”，意指老实憨厚，不开化，不善交往，不会趋时追新、灵活应变。文化之“土”，从理论上分析，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乡土性和原始性。所谓乡土性，即云南文化的本土化气息比较浓厚，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分化尚不十分明显，具有地域特色的大群体（民族）文化仍然占据着主流的地位。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古滇国的青铜器上所反映的贵族，不过是生产、宗教仪式中的首领或监督者而已。南诏大理国的王公贵族，也与老百姓一样赤着脚。如《蛮书·卷八》所称：“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将军亦不以为耻。”著名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上，此一情况更有形象的反映。这也难怪。考其出身和实质，他们只无非是一些大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罢了。在云南的乡土社会中，各民族文化主要执掌人的巫师（如东巴、毕摩、魔巴等等），都还没有从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这里大约只有傣族是例外）。另外，云南的城市化程度非常之低，市民阶层也出现甚晚，而且范围、数量都十分有限，这就很难构成在文化创造或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力量。于是在滇文化中，我们自然不容易发现雍容华贵的宫廷（贵族）文化，温文尔雅的士文化，世俗享乐的市民文化，它基本还是一种整体性的与农耕（畜牧）——狩猎（采集）息息相关、与种族繁衍息息相关的乡土文化。

原始性即滇文化中还残留着较明显的原始文化形态的痕迹。云南的社会发展较为缓慢。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尚处于“编发左衽，随禽迁徙”的原始部落社会。西汉时，滇池、洱海地区、曲靖、昭通等滇中、滇东部分虽已“耕田，有邑聚”，腹地坝区以外的边地及山区仍很落后。直至明清时

期，云南还有民族“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以树皮为衣，……无酋长约束”。¹ 此外，一些民族的社会经济仍停留于狩猎、采集为主的阶段，如部分佤、德昂、布朗、独龙、拉祜、苦聪人、彝族山苏人；一些则停留于原始农耕（锄掘）或畜牧为主的阶段，如部分佤、德昂、布朗、景颇、哈尼、拉祜、基诺、苗、瑶等族人。从婚姻——家庭形态说，永宁摩梭人一直保存着较原始的对偶婚制——阿注婚。从习俗说，佤族的猎人头习俗是解放后才革除的。从观念形态说，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巫术等残留余痕随处可见。即使如受佛教侵染很深，有“全民信教”之说的傣族，其原始的宗教观念仍未消亡。人们不独礼佛、赕佛，也崇奉本土的寨神、勐神，在其神话传说中，谷神奶奶的地位甚至高于佛祖。又如云南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几乎可等同汉族的白族，一方面修习儒家经典、兴建佛门塔寺，一方面却举行盛大的“绕三灵”活动，遐迩闻名的石宝山歌会，这都可追溯到原始群婚野合的遗俗。最令人惊叹的是，在杰出的剑川石窟中，除雕刻着佛教密宗的各种偶象和南诏王室的造象外，还有一窟的莲花座上赫然供奉着“阿央白”——一块女阴状的石头。白族妇女来此求子，或在开裂处涂抹香油——求顺产。或许，只有真正了解滇文化中的原始内涵，才了解滇文化的底蕴。

上述特点，是否在另一层面上构成了滇文化的特质？

在一种文化中，如果语言——思维模式是其最基本和核心的部分，那么审美模式则是其最升华和显露的部分。审美模式

¹ 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

² 《滇略》卷9。